

吴于廑早期学术研究与后期世界史理论建设*

马 瑶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摘 要】 作为建国以来构建世界史理论体系的新创者,吴于廑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也即硕博学位论文中所积累的学术知识,主要以中国史的领域为主,但却对其以后构建世界史理论体系产生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古今中外史家的世界史观方面的评价,在世界历史的分期方面以及对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关系方面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吴于廑;学术积淀;世界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5)01-069-04

众所周知,吴于廑是建国以来世界史理论体系的新创者,学术界对于吴于廑的史学研究成果颇多,但对于他早期学术研究即硕博学位论文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其早年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哪些知识,且对其后来构建世界史理论体系具有哪些作用,这是以下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早期学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日本侵华时期,吴于廑在昆明经陈序经推荐,得以在西南联大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且读了经济史及经济学方面的原著^[1]。但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完成了一篇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硕士学位论文,从中可以窥其当时的知识累积状况。

该题为《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主要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新兴阶层“士”的活动与思想中,透视当时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后来秦汉统一局面的形成。由于此文主要研究的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历史,因而作者查阅了大量中国古典史籍、经文,如《史记》、《汉书》、《孟子》等,进行一定的积累、整理后阐发自己的观

点。如他在分析封建帝国的衰落时,引用了《史记·周本纪》中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自周代封建帝国日渐衰微以后,有人曾经尝试进行统一或者恢复到帝国兴盛的局面,但是这样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西周后期,周厉王企图总揽天子大权,但却遭到了封建贵族的反对,特别是彘之乱成为贵族反对天子集权总爆发的标志。后来厉王失败了,经过十四年的共和行政,由其子宣王即位,即位之初与贵族合作取得征西戎伐严狁的成就,但是后来就与贵族齟齬,一无所成^[2](P9-10)]。再如引用《孟子·尽心上》中的例子,说明士所理想的社会应该以农业为基础^[2](P77)],援引《汉书》中的百官公卿表说明在秦国至商鞅变法,所列爵二十等,皆以赏功劳,身份官职就由原来的封建世袭转变为流通的身份制度,从而说明身份的流通并不是在统一帝国形成以后才出现的^[2](P137)]。此外他还援引了很多古典史籍,大体把握住了所要论述的观点。

可见这篇论文是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积累

* [收稿日期] 2014-04-27

[作者简介] 马 瑶(1984-),女,江苏镇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E-mail: mycrossba@163.com.

的成果,认为士这一新兴阶层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以及统一局面的形成。而不同于当时学术界的流行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是由于商业势力发展的结果。但该文并不是完美无可挑剔的,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比如社会学家吴景超就曾对吴于廑关于吴越秦楚四国中,吴越可能没有封建制度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3]

二、早期学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1939年清华恢复了庚款留美招生考试后,^[4] (P223,224) 吴于廑于1940年参加了考试,凭借着其前期的经济知识积累,以总均分82.88^[4] (P233,234) 的高分获得了公费留美名额。史家何炳棣曾回忆此次考试时感叹到:“保安兄^①,我是你手下败将”^[5] (P131)。1941年秋吴得以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当时哈佛教授查利·麦凯尔文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巨擘,十分关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事件的细节^[6] (P815),由此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向其学习,而吴于廑也是其中之一。他对西方政治法律史发生了兴趣,在与其原有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相碰撞后,进行了中西封建时代政治法律的比较研究,从而诞生其博士论文,从中可以了解其学术积淀。

其博论为《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将封建欧洲与封建中国作对比,认为两者的历史时期虽不一致,但其法律都是善古之法,以非成文的形式存在,不可更改、废除,都遵循皇权至上的原则等。而差别如欧洲的封建制发展是自下而上的,中国则是自上而下的,随着新的立法与王权概念的兴起,两者的封建概念便都会消失。此文引用了很多硕论中的文献,如《史记》、《汉书》、《孟子》等,还增加了其他文献来证明其观点。如多次引用《诗经》中的材料,认为尽管在中国封建时代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发轫于封建初期的王权概念并没有全部消失。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说明了在周初中央权力很强大的时候,是具有王权概念的。他还引用《诗经》中的其它例子说明国王是有权授予封臣封地的^[2] (P218-219)。但是在更深入的研究与资料的积累中,他对一些史料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如他在硕论中多次引用过《商君书》,而在此文中则指出该书是伪书的可能性,保留谨慎的怀疑态度后,才引用分析了该书中的史料。此外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如在硕论中认为商和周都是封建帝国,但在此文中其仅采用西周封

建说的观点,由此虽不能知其是否还赞成商的封建说观点,但可确定的是,他进一步确定了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这也是他经过多年的封建法律与王权方面的知识积累的写照。

西方学者在进行政治法律的研究时,往往耗费大量笔墨进行理论逻辑上的分析,如在其文中引用次数较多的麦凯尔文的《西方政治思想的成长》,就主要从理论上分析古希腊到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的历史^[7] (P102)。②而吴在其文中也重在以理论结合消化了的史料知识来分析其观点。如他分析中国封建法律起源时,并未直接引用《礼记》中“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而是在理解这一史料的基础上,认为“有一个成功的原则支持着夏商周三朝的法律,那个原则就是人民服从于它”^[8] (P271)。由此他分析到,既然人民都遵循这三朝的法律,那么当先圣王们在建立法律时,必定要考虑到人民所遵循的这些法律习俗,为了了解这些法律习俗就必须咨询人民中知晓这些习俗的长者。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一历史现象,他便与西方的历史作了简单对比,认为“这种耆老的咨询,与罗马法中的智者解答极为一致。智者本身不是法律,但他们能阐明法律知识”。^[8] (P272) 可见这正是因其积累掌握了一定的中西方法律、政治史等方面的知识,并且融会贯通,才能以理论结合史实分析两者的异同。

该文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性在于,吴于廑在两者都是封建制度大致相当的背景下,并没有机械地将欧洲的封建公式照搬进中国历史,而是详细分析了两者的差别,也没有教条地迎合西方某些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论断,而是在两者的差别中认识到,在秦汉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之前,有相当长的时间君权是受到法律约束的。而其文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性,是与其在政治法律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分不开的。

三、早期学术积淀与后期理论体系建设

由以上对吴于廑早年学术研究与积淀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有三个方面对其后来的世界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分别为对古今中外史家的世界史观方面的评价,在世界历史的分期方面以及对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关系方面。

第一,吴于廑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古史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则来源于各类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等,这就为其后来进行考察古今中外各史家的世界史观奠定了知识基

础。如他多次分析了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观点,总结出他们的缺陷,从而为避免他们的缺陷而倡导一种世界全局的观点。他在《时代和世界历史》一文中分析了古希腊史家波力比阿的《历史》后,着重分析了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司氏心里怀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抱负,所写不是局限于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而是写自己所知道的“天下”,因而是西汉时代的世界史家。但同时又有局限,首先是地理方面的,司马迁所认为的世界,也仅仅是将《大宛列传》中的西域以及东边的朝鲜包括在内。另一个则是司马迁的世界史观存在着“夷夏之辨”的局限,他列举《太史公序》中的“汉既通使大夏,而极远蛮,引领内乡”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9]而在《关于编撰世界史的意见》一文中,又强调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这些局限,认为司马迁所谓的“世界”,除了当时秦汉疆域外,东边包括朝鲜,西边包括大宛、大夏,直到安息、条支一带。而在这样的世界中,其中心是司马迁所在的汉,而外围则是司马迁所认为的应该接受中国教化的蛮夷,^[10]之后在《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11]以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的《世界历史》中都有所引证。特别是在《世界历史》一文中,不仅再次引用了司马迁的《史记》,还引用了班固的《汉书》。他认为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历史的同时,还记述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的史书虽然详于本国,而薄于“蛮夷”,但毕竟包含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12](P42)}。从对司马迁、班固等古代史家的著作的分析中,他认为这些史家虽然都有各自时代的世界史观,但都各有各的中心观,因而他提倡世界史观不应以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为世界史观,也不应以中国中心论为世界史观,而应是一种整体全局的世界史观,这样的世界史观才能不带偏见地指导着世界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可见,正是吴于廑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中,积累了有关中国古代史家著作中的知识,才能在后期的世界史理论体系建构中,以一种全局观构建世界史的理论体系。

第二,在世界史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他并未机械地将世界历史依次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大致将其划分为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农为本的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工业与社会主义工业并存的时代。他认为这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亚欧大陆各农耕中心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世界历史上划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12](P53)}。由于其在早年的这两次学术转向中,一是社会经济史的转向,二是法律政治史的转向,两者都涉及到有关中西封建历史的比较。他认为中国封建制的时代主要为西周,而到春秋战国时代则逐渐解体,直到秦汉即公元前221年以后形成大一统的专制时代。而欧州的封建制时代则是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即公元5世纪,并且欧洲的各地区进入封建时代的时间也不一致。显然两者的封建时代不是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段,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的奴隶时代与封建时代的具体时限的划分也没有定论,欧洲同样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所以在世界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古代世界,不同地区的这种差异,以及不同阶层的人在各个时代所占比重的不同,很难界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时限,因而没有教条地采用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而是看到了这两种社会的共同特征,即以农为本的经济特性,从而将其划分为以农为本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可见若不是在其早年的学术研究中,有了具体入微的历史积淀与深刻体会,即使凭借他人的专门研究,也很难在构建世界史的宏观架构中,不落“俗套”进行机械地分期。

第三,在其早期学术研究中,对《诗经》、《史记》、《孟子》等的积淀,对其考察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论述欧亚大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形成与并立中,他认为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农耕中心,有以耕种小麦、大麦的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带,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还有以玉米为主的墨西哥、秘鲁,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而其中因对《诗经》的知识积淀,对于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农耕类型的看法,就不同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印度和黄河流域为小麦区,而吴于廑则认为中国的黄河流域独具特色,在这里应该是种植小米的,而长江以南到东南亚、印度河一带则种植水稻。因为他认为在《诗·风·七月》中“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苽麦”中的“禾”就是小米,而清代学者陈奂也这样认为。^[13]从而与斯氏的观点相比,他则以详细的证据说明了中国农业类型的特色。再如,在论及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的第一次冲击浪潮中,他引用《史记·周本纪》中的例子,即“诸

侯兵合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以及《孟子·尽心》中的“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来说明在当时中国境内,差不多同时期内,也发生着一次车战。他认为虽然前者4000乘的数量可能有所夸张,而后者300辆可能会比较接近真实,但不管马拉战车的数目究竟有多少,这一次车战规模肯定是比较可观的。^[13]由此可见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中,对《诗经》、《史记》、《孟子》等的积累,为其后来进行著名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世界的研究打下了知识基础。

可见虽然吴于廑早年的学术研究以中国古史为主,但其中所积累的《史记》、《汉书》等为其后来分析古今中外史家的世界史观奠定了基础,从而倡导一种整体全局的世界史观;并且在其硕博论文的研究中,特别是中西封建制的研究实践,使其后来的理论建构冲破了机械的世界历史分期,形成一种新的分期。此外,其在早年学术研究所积累的《诗经》、《孟子》等知识,为其后来分析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吴于廑早年的学术研究与积淀,在其后来的世界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注释:

①吴于廑原名吴保安。

②比如麦凯尔文认为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罗马法是十分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并不在于罗马人对于罗马法的原创性丰富了世界的政治思想,而在于它是西方世界的法律政治实践的基础,还在于它汲取了古希腊的政法观念的精髓,然后传播给了崛起的西欧人。其中为了说明对古希腊的继承性,麦凯尔文采取了内证与外证的方式。如引证哈

德良时代的一位法学家 Pomponius 的观点,即十二铜表法便是基于希腊城邦时代的法律而制成的。

③鉴于当时相关学术研究的局限,吴于廑并未确定这是一场游牧民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只确定了这是一场马拉战车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 [1] 吴于廑.吴于廑自传[J].晋阳学刊,1983,(4):76-80.
- [2] 吴于廑.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3] 吴景超.书评[J].新经济,1942,(9):18-20.
- [4]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Z].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 [5]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6] [英]伊丽莎白·迪瓦恩.世界著名思想家辞典[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 [7] Charles Howard McIlwain.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M].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
- [8] 吴于廑.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9] 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J].江汉学报,1964,(7):41-53.
- [10] 吴于廑.关于编撰世界史的意见[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5):34-40.
- [11] 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4):1-10.
- [12] 吴于廑.吴于廑文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13]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J].云南社会科学,1983,(1):47-58.

(责任编辑 郝银侠)

Wu Yujin's Early Academic Study and his Later Construction of World History Theory

MA Y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As a founder of construction of world history theory in China, Wu Yujin had accumulated much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in his youth when he completed his MA and PhD dissertations. However, these academic accumulation had effe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history theory in his later study, such as on the evaluation of historians' world history views, the division of periods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madic and agricultural people.

Key words: Wu Yujin; academic accumulation; world history theory